

蒋期馨 / 著



我的百味人生
浮华与苦难



商事 情事 文章事 往事遗多少？
父母情 夫妻情 儿女情 最是人间真情。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蒋期馨 / 著



我的百味人生
浮华与苦难

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浮华与苦难 我的百味人生

著 者 / 蒋期馨

责任编辑 / 刘冬冠

装帧设计 / 零 语

责任制作 / 晏恒全

责任校对 / 周国信

出 版 / 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(200336)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<http://www.ydbook.com>

发 行 /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制 版 /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印 刷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
装 订 /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版 次 / 200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269 千字

印 张 / 10.75

插 页 / 1

印 数 / 1—4 300

ISBN 7-80706-086-7

K·48 定价: 28.00 元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一个普通人经历的大历史；

一个文化人所承受的生存之苦和生命之痛。

1

从我听懂人言、牙牙欲语那天
起，就现出聪明来。

1929年正月二十一日，我生于浙江省嘉兴县（现改市）王店镇（现改区），家中兄弟姊妹7人，我行四。

大哥其昌，字志贤；二姐瑞芬；三哥其祥，字云鹏；五弟其民，字志新；六弟其巩，早年夭折；七弟其雄，字志伟。我名其鑫（后改“期馨”），字志高。

父亲蒋翼如，字贻谋，小名连生；母亲张惠珍。祖父蒋镜翥，娶祖母后，祖母未生育即亡故，复娶填房，仅生1女，即病逝。祖父在46岁上又娶朱氏为继室，又生2女，大的我称为泉伯，小的我称为福伯。生我父亲时，祖父已整50岁，老年得子，其喜可知。未久朱氏又谢世，复娶继室，此时祖父须发已白，染黑后成亲，复生1子1女，我称之为玉叔、菊伯。那时连仆婢丫环在内，全家共20余口，开销庞大，而收入仅靠祖父开设的一家丝绸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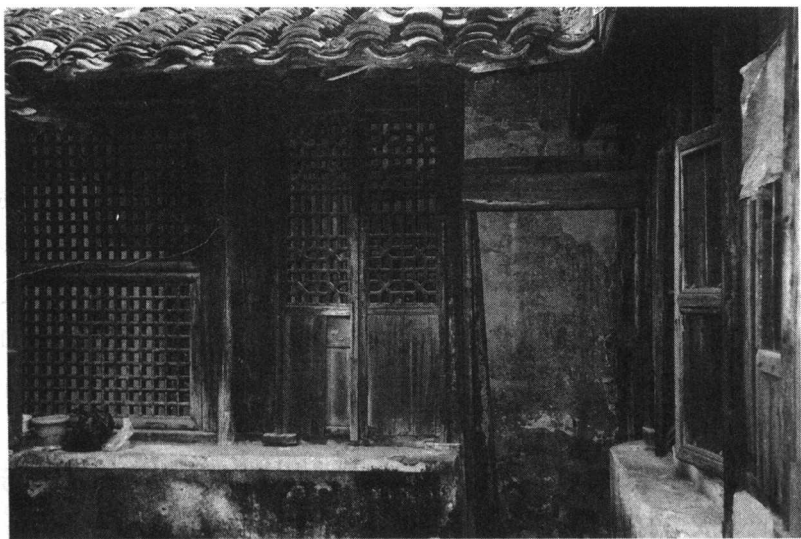
我出生时，祖父母俱已离开人世，泉伯、福伯、菊伯都已出阁，玉叔也已成亲。

我未满周岁时，一次，母亲替我换尿布，突然发现我右腿有一肿

块，一年中连用了近百张麝香膏药，肿块不但没有消退，反而变成了巴掌大小的一块。父母亲急了，抱我乘火车到上海请最著名的西医牛惠生、牛惠林兄弟会诊。他们摸了肿块后，抛出一只皮球，叫我过去捡，看了我的走路姿势后，对我父母说，只有动手术开刀切除。在20世纪20年代，听到“开刀”二字，母亲急得哭了，恳求大夫想想其他办法。两兄弟回答很干脆：“这是先天带来的，对性命无碍，不开刀只有听其发展。”父亲问：“将来会大到什么程度？”医生答：“人长大了，腰多粗，瘤多大。”母亲舍不得儿子受一刀之苦，快快回家。

从我听懂人言、牙牙欲语那天起，就现出聪明来。那年，我的肿瘤已长到大口径饭碗这么大了。一次，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：“其鑫这瘤生得部位不妙，瘤生在下面，我看将来不要成为一个‘下流（瘤）坯’”。这深深刺痛了我，于是我发誓要奋发努力，出人头地。

离我家百步之遥有一所冯氏私塾，我的启蒙老师冯咸熏就在那里。冯先生执教甚严。我读的第一部书是《百家姓》，继而是《三字



王店老家。



王店老家。

经》、《千家诗》等等。每天上午上课，下午背书。我大多过目不忘，背诵如流。背《千家诗》第一首时，老师闭目静坐，手执戒尺，神态严肃，听得满意时，摇头晃脑。当我背到“云淡风清近午天，傍花随柳过闲川；时人不识余心乐，将谓偷闲学少年”时，俨然四三、二五，二五、四三，平平仄仄，仄仄平平，冯先生不禁笑谓众生：“听听蒋志高是怎样背的！你们谁及得上他？”大家听老师这样称赞我，也都对我刮目相看。

我觉得上这么一节课不过瘾，一回家便看父亲购置的古书，从“五才子书”、《西游记》、《聊斋志异》直到《说唐全传》等等。有些字我还不认识，意思也不清楚，便偷着问我表哥张勇为。问一个字的代价，是让他在我头上敲一记，不然不教。为此，我深知求学之难。当时人云：“看了天宝图，忘了肚皮饿。”我则不然，翻来覆去看一部《三

国演义》，直到60岁不辍。

冯老师看我聪明，读书又认真，所以每每离塾外出时，总叮嘱我看好同学，用心读书写字。但他只看到我好学上进的一面，没注意到我还有“顽劣”的另一面。

一天，他午膳后外出，依然是几句交代：“看好同学，用心读书写字。”殊不料，他刚一出门，我即招呼同学：“来，玩一次‘登台拜将’！”听说“玩”，大家拥上前来问我：“怎么玩？”我说：“快把方桌叠起来！”我则从椅子上跨到桌上，将老师的戒尺一挥，喝一声“众将听令”。同学们尚不知这是什么玩意儿，冷不防听老师一声咳嗽，跨进门来。众学生一哄而散，纷纷归座。但我身在两张方桌之上，离地面约有6尺高，惊愕间还是靠老师踏上方凳扶我下来。但一顿戒尺，打了我足足10下。

4岁年纪，为何会玩“登台拜将”，又喝什么“众将听令”，原来这是从我父亲那里得来的教育。

我的第5代祖上，原籍安徽，是当地巨商，为葬祖而欲觅一块风水宝地，为此带了风水先生，坐船沿江南下。船行到王店、硖石一处名叫高桥平桥的地方，那先生突然觉得双目迷糊，连说：“宝地！宝地！如果安葬于此，百年之后，后世必兴！”于是，全家乃迁至王店，择在大井弄边造了一座七进宅院。

大井井水清澈，从水中可见一棵大树，树影婆娑，为一奇观。祖上在此开了一家粮油行、一家丝绸庄。到我祖父镜翥公时，有一张姓同行，借了我祖父3万银元，久借不还，祖父几经交涉未果，被逼向嘉兴县衙告状。无奈张家是当地劣绅，欺我祖父是外省人，勾结官府，反诬告我祖父凭一纸借据讹诈。结果祖父被收入大牢，判刑3年。此时末代皇帝宣统登基，父亲年仅12岁，一门妇孺全没了主张。

两年后，14岁的父亲带了200银元步行到杭州府，乞求一大讼师写一份呈状。早晨6时叩门求见，门上人回说不在。连续7天，天

天都吃闭门羹。父亲悲愤不已，矢志自撰呈状。

父亲也是个聪明人，书读得多，字也写得好。一部《论语》、一部《中庸》，加上《朱子家训》和《曾文正公书简》，都是必读之书。气愤之下，一夕之间，呈状写好。次晨即往杭州府击鼓鸣冤。府尊看了呈状，见父亲年纪轻轻，疑为他人捉刀，便让父亲当庭背诵呈状，并对证笔迹。府尊又见父亲一个年轻人，栉风沐雨跋涉两百余里，涕泪纵横地为父鸣冤，就收了呈状，传被告 10 天后到庭对质。

无奈张姓被告蛮横，又上下打通了关节，结果只宣判原告无罪释放，借银 3 万分文没还。父亲据理力争，官府说无凭无证，无从判还。原来借据已被嘉兴县销毁。

这场官司，钱没要回来，却种下了祸根。

2

我从小受父亲熏陶，加上受祖
坟被毁一事刺激，立志要出人头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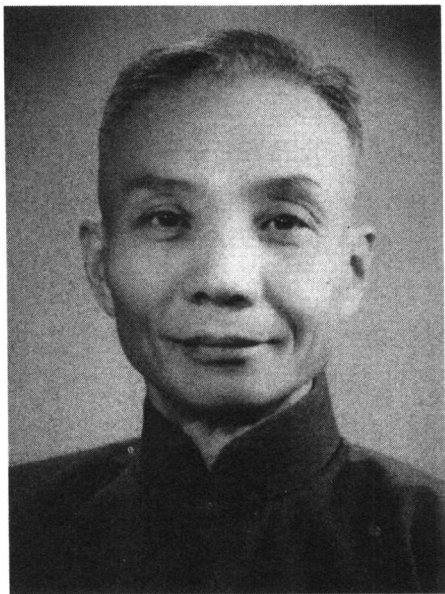
此后不久，当地掀起一阵兴建铁路之风，从上海到杭州要修一条铁路，铁路督办恰恰是张氏嫡子张鹤轩。此人颀长身材，相貌如鹤，鼻尖口方，为人颐指气使，行走在王店镇上，行人纷纷躲闪，为之侧目。张鹤轩做了沪杭铁路督办，越发不可一世，知道我家祖坟所葬地高桥平桥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，便蓄意破坏。当铁路铺到王店向硖石延伸之际，竟擅自变更图纸，不沿直道铺轨，却从我家祖坟中央横穿而过。

我父亲闻讯赶到现场，虽几番抗争，却也无用。

祖父出狱以后，积怨成疾，一直卧床不起，惊闻此变故，便溘然长逝。为办祖父丧事，父亲大事铺张，大堂、二进、三进设立了三通鼓。所谓“三通鼓”，即前来吊唁者，每进一进擂鼓三响，每一进都有小辈磕头还礼，直至灵前。出殡那天，白幡招展，一路的纸车纸马。父亲扶柩而行，乃葬于东桥祖坟西侧。

祖父去世后，几年折腾，家道中落，只留下 500 银元和一家粮油行。20 岁上，父亲才娶妻。

我母亲张惠珍，娘家也是一门望族，祖上世代为官。外祖父因不满当时的政治腐败，弃官从文，任上海《申报》编辑，与杨乃武共事。外祖父生有1男2女，我母亲为长，弟次之，名庭华，幼妹惠明。外祖母戴氏，原是王店首富家的千金，因慕外祖父才学，乃不惜弃富就贫，出嫁后随夫移居沪上。不幸外祖父英年早逝，一家4口扶柩返乡。那年我母亲9岁，其二弟7岁，幼妹4岁。



父亲蒋翼如。

外祖母靠妆奁丰厚，居寡抚养子女。女儿长大成人后，外祖母在择婿上有她的标准：大女儿嫁的人只求有才，不图有财；小女儿嫁的人则只要富贵，不论才情。我父亲青年时已在逆境中独撑门面，外祖母看中他的才情，乃以长女许之。幼女惠明，则嫁给在当地有“半条街”之称的富翁姚再远。

父亲屡遭打击之后，认定只有跻身于上层社会，才不会受人欺负，便热心公益，广交朋友。这时的王店，北有首富潘静兰，次为陈彦石；东面为冯日宣、冯永言昆仲。冯氏昆仲敬慕父亲为人正直、博学多才，故屈尊交纳，成为莫逆。当时王店区长王祥良，对父亲亦十分赏识，聘父亲为本区钱粮户口的主管，月俸16元，全家人便靠此糊口。母亲与二姐则夜间在灯下折箔，贴补家用。

我从小受父亲熏陶，加上受祖坟被毁一事刺激，立志要出人头

地。于是发愤学习,5岁已读完《幼学琼林》。6岁那年,王店新建了一所中心小学,是个正规学校,我乃报名入学。考试时,人家问我要读初级班还是一年级,我说起码二年级。人家嫌我冒失,我当即背诵了几首《千家诗》,乃获通过。学的课程是语文、算术,当年考试,我名列第一。7岁时升三年级,复如故。老师姜冰如常称赞我是“神童”。

这时我右腿上的肿瘤已长到小芭蕉扇一般大,同学可以立在上面不倒。每逢酷暑天,我出门总要带上一把大扇子,挡住右腿以防路人窥笑。

8岁时升四年级。开学后第5天为星期一,按例这一天全校师生都集合在纪念堂,由校长领背总理(孙中山)遗嘱。当背到“余致力国民革命,凡四十年,其目的在中国之自由平等,积四十年之经验,深知……”时,我控制不住,失口咳嗽了一声。校长突然停住了领背,厉声喝问:“是哪个咳嗽?”我说:“我。”校长大声训道:“原来是你蒋志高!一个免费生竟敢公然咳嗽,给我上台来。”我羞愧满面,姗姗走上台去。他又断喝一声:“给我站好,罚你一小时立壁角。”立壁角即是面壁而立。于是我挺直身子整整站了一个钟头。我满心委屈,噙着眼泪暗暗恨道:“胡民瞻(校长姓名)呀,胡民瞻,你身为师长,竟也这样势利。我就是因为家里穷,才托人说情,免缴学费,却被你嘲为免费生,如此当众羞辱。”最后还是姜冰如老师扶我下了台,我则强忍悲痛,鞠躬致谢。待等放学回家,看到母亲,便倒在她怀里放声大哭。当晚灯下,父亲在纸上写下4个大字——“忍辱负重”,反复向我解释,并要我继续上学。

未几,“七七”事变,抗日战争打响。10月间,日机投下了3枚炸弹,全镇惊慌,纷纷逃难。我全家也避难到王店10公里外一个叫“张家舍”的地方。此时五弟、六弟均已出世(六弟在5岁那年夭折),大哥则已到上海顺兴绸厂做学徒。母亲此刻偏偏又怀孕在身,这时举家度日艰难,如何再生得起孩子?便左右打听谁家愿意领养这个未

出生的婴儿。但那个时候，家家户户自身难保，哪有这份扶贫济困、弄儿抚女的心情！

日军侵占王店后，自有一班汉奸组织了“维持会”。淡忘了炸弹惊吓之苦，全家又回到了镇上，不久七弟出世。全家正在为举炊发愁之时，却不料天无绝人之路。

父亲有一挚友，姓周名向寰，家住泰石乡，饱读诗书，又谙熟孙子兵法，却不愿出仕从政。周家有田20亩，便在家自耕自读，妻子则采桑纺织。周向寰平素为人旷达，为乡里人所仰慕，与父亲交厚，人称“管鲍”。我还依稀记得这位周伯伯，浓眉阔耳，给人一种正气浩然的感觉，对我们晚辈却平易近人。

一天，周向寰到我家来跟父亲密谈了半日。后来知道他正在联合四乡爱国壮士组织一支抗日联军。周向寰自任总队长，下设3个大队，每一队辖3个中队，依次划分小队，共有联军800人。其任务是保家卫乡、反击“扫荡”，并伺机摧毁日军碉堡，夺取枪支，武装自己。

但要维持这样一支联军，没有经费不行，于是决定成立抗经费征收组织。又恐怕所用非人，为害百姓。因深知父亲为人，所以亲自登门请父亲负责经费征收工作。父亲对此考虑有三：一可以为抗日大业做些事；二可以凭自己的作为约束部下不鱼肉乡里；三则为自己打算，有点俸禄也可使子女免受冻饿之苦。于是慨然答应出任抗日经费征收处主任。

征收处下有征收员12人，规定凡本地商号船舶过境，概不收税，小本经营的同样处理。

一天，有位商人上我家来，诉说他只贩了5匹龙头细布，搭乘便船过关卡时被缉查员截留，无奈之下向父亲苦苦哀求，并奉上2两白木耳作为孝敬。父亲当即与他一起出门，当时天正下着瓢泼大雨，父亲顾不得张伞换雨鞋便匆匆走了。先陪他退掉了刚从种德堂药店买

来的白木耳,再到关卡,责令缉查人员将他的船放了。旋即召开全体会议,开除了该员的公职,并再次重申:如有违反征收规则,再犯类似事件,一律不予姑息。

话虽如此,但父亲心里明白,设卡收税,每天过往的船只成百上千,有几个不见钱眼开的?父亲良心难泯,所以决定向周向襄辞职,并推荐他的副手陈振之为代主任。当时镇上人都认为这征收主任一职,不啻是摇钱树、聚宝盆,这样的肥缺不要,岂非傻瓜。但是也有人称赞父亲清白如水,暗自钦佩。其中就有北塘街的第二富陈彦石,并随即上门礼聘父亲出任他的茧厂经理。

原来,王店四周农民年年都采桑养蚕,卖茧是日常收入的重要来源。茧厂每年收购的蚕茧达2000担(一担为50公斤)以上,收购后脱茧引丝,然后由作坊开机织绸,运往上海。

由此父亲经常到上海出差,渐渐地上海也有了朋友。当时大哥已逐步由学徒而职员,其后升为副厂长。那时的一家厂子,职员、工人加起来,也不过20来人。

我从张家舍避难回家以后,一直靠看稗官野史增进知识。从《封神演义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镜花缘》到《薛仁贵征东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、《薛刚反唐》,只要有书,每书必看。晚上父亲集合我们兄弟上课,听他讲授诸子百家。

我一听到父亲的一声“集合”,便雀跃不已。父亲常常以一副对联“好读书不好读书,好读书不好读书”破题,要我们认真听解。我乍听不知其故,问父亲:“既为对联,怎么上下联会一模一样?”父亲说:“这就是中华文化深奥之处。”读对联要懂平、上、去、入,就是说有的字本是平声,可以读成入声。以这联为例,上下联虽是一字不差,读起来却全不一样。上联“好读书不好读书”,第一个“好”字应该读平声,而第二个“好”字应读上声,意思是说:在你有机会读书时,你应该好好读书;而下联则不然,平、上二声对调读,则意思

就明白了,即:你想到要读书时,岁月不饶人,机会难再得。“所以说,做父亲的教你们上课,这就是机会,务必要专心致志,不要囫圇听,而要反复问。‘学问’两字,即不但要学,并且要问。”

他还教导我:“喜欢看书是好事,说明你肯学,要学,但也不是‘开卷有益’,这要看读哪一类书。”

听了父亲这番话后,我专心致志翻来覆去看《三国演义》,也不知看了50遍还是80遍,总之不论是《铜雀台赋》、《前出师表》、《后出师表》,还是《回目》、《评语》,我都背诵如流。

虽说每天浸在书堆里,但我想,不正规读点书,总不是饱学之道。中心小学的课本我嫌太浅,于是仍求学于冯氏私塾。但是家里情况我明白,我不忍心向父亲伸手,就偷偷将一件姐姐为我织的绒线衫投入了典当铺,换了4块钱缴学费。后来天冷时母亲见我穿得单薄,知道原委后大哭了一场。

入学后,我提起精神,加倍用功,先后读了《孟子》、《大学》。一部《古文观止》,照例是选读的,但我这时活像饿羊走在草地上,精读的也读,选读的也读。

正当我如饥似渴的时候,父亲又从上海为我买来了厚厚两本《辞源》,重达10斤,价钱也极为昂贵,市值60元,另加上一副乒乓球拍,令我喜出望外。因为这一年日寇在嘉兴、湖州一带大举“扫荡”,兽军过处片瓦无存,哪家能养蚕宝宝?王店区则因有泰石乡这支强大的抗日联军,小股日寇滋扰四乡时每每被联军打得狼狈逃窜,蚕茧尚能丰收,而其他地区年成都不好,因此丝价大涨。陈彦石先生获利丰厚,慷慨酬我父亲红利8000元,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。

陈氏尝到了甜头,又在塘桥东侧开了天益布庄、恒泰香烟批发行,也由父亲兼任经理。这一年是父亲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日子,也是我们弟兄几个人人都能在新年换上新衣服的喜悦时光。可是好景不长。

3

正当我们玩得高兴的时候，突然
冲进来十几个身穿黄军装、头戴太阳
帽、腰别盒子枪的日本宪兵……

1939年的元月初八，父亲原本邀约了朋友到我家来“烟聚”的（记不清父亲是什么时候染上此“芙蓉癖”的）。下午1点，他突然心血来潮改变了主意，下楼来对我们说：“殷朗庭（即父亲约的朋友）来，可请他到何家厅找我（离我家百步之外的一家烟子窝）。”说罢匆匆出门。这时二姐、三哥、我及福伯（正巧春节归宁）正作“方城之戏”。我当时虚岁只有10岁，牌艺已很不错。

故乡风俗，每逢过年，不论穷年还是富年，家家户户从腊月（即旧历十二月）二十五起到新年元宵止，都有推牌九、打麻将、掷状元红等习惯。说来也难怪，小镇上即使逢到过年，除了吃烧卖、看花纸、跑亲戚以外，就连草台班一年都难得看一次。

正当我们玩得高兴的时候，突然冲进来十几个身穿黄军装、头戴太阳帽、腰别盒子枪的日本宪兵，为首的挂一把佩刀，显然是这群人中的头目。只见他横眉竖眼，嘴里叽里咕噜，一个汉奸翻译吼道：“蒋翼如人呢？”本来天就冷，经这一吓，我们几个不禁都簌簌发抖。我年纪虽小，胆子倒还大些，大声说：“不在！”汉奸翻译后，只见那小头目

吼了一声，大约是喊“搜”！顿见众宪兵冲上楼去，连灶间、柴间都搜了个“人仰马翻”，父亲确实不在家里，又能搜出什么！他们只好一声呼啸出了门。

我便尾随在后，见他们向西走去，大冷天我不觉急出了一身汗。跟着跟着，见他们一直向西，我心里才一块石头落地，忙奔到何家厅找父亲。父亲的烟友说：“你父亲知道一群鬼子进了你家，榻还没有坐热便慌张跑了。”回家后我对母亲说了，她也听说宪兵是往西走的，便说：“岂不是要和你父亲狭路相逢？”急得只是哭。

一夜没有消息。5天过去了，仍音信杳然。全家陷入了不安、焦虑、彷徨之中。正惴惴不安间，一天，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，自称姓张，说：“蒋先生已平安到了上海，现住在二马路恒源客栈，要你们全家搬去。不要坐火车，先乘船到硖石，然后再由该地搭车去沪，以保安全。”

母亲则坚决不依，说：“上海物价昂贵，7口之家，如何能养活得起？即使住下，也是住不长久，与其还要回来，何必多此一举。”姓张的说：“蒋先生有一张字条带给你，要你们去陈彦石先生那里取8000块钱，足够用上一两年。何况蒋先生或许能在上海生意场上再显身手，何愁站不住脚？等抗战胜利后，大家高高兴兴回来岂不更好？”母亲尚在犹豫，姓张又说：“你们如果不去，从此便断了音讯。因为蒋先生不便写信，惟恐日本宪兵队在邮局派人检查信件，机关败露。”

三哥和我力劝母亲：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我建议这8000块钱不要全部带上，用2000块钱买80块菜油，寄放在姨夫仓库之中。狡兔尚有三窟，兵分两地，比较安全。三哥深表赞同，说四弟没有白读《三国》，小小年纪，心思缜密，不容易！

诸事办妥，在母亲生日那天（正月十五），我们全家按照张先生指引的路径平安到达上海。

不料，到上海当夜便不平安。恒源是一家小客栈，父亲只开了